

# 乡土情境中的异域信仰

## ——近代中国天主教民的信仰特征

李勇 刘丽敏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 文章以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为对象,将教民在日常生活及义和团运动这两种不同情境下的信仰状态与行为状态结合起来考察,从宗教信仰的形成、发生及其对教民日常生活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的信仰特征作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剖析,由此揭示中西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在中国下层社会冲突、离合与熔融的过程。

**〔关键词〕** 乡土;宗教信仰;天主教;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89(2009)02-0127-04

在中国独特的宗教文化体系的建构下以及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的熏染下,中国乡土民众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信仰逻辑和信仰习俗。因此,当他们遭遇来自异域的天主教时,其原有的信仰逻辑和信仰习俗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天主教教义的理解与接受。那么,他们是如何应对二者之间的差异的?他们的信仰又呈现出怎样的风貌?本文将依据《拳时北京教友致命》<sup>①</sup>与《献县教区义勇列传》<sup>②</sup>两套文献,将教民在日常生活及义和团运动这两种不同情境下的信仰状态与行为状态结合起来考察,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的信仰特征作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剖析,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从一个侧面来丰富学术界关于中西宗教文化交流的研究。

### 一、异同的置换与新旧的错合

教民宗教信仰的形成过程总体上表现为异与同的复杂置换、新与旧的离合交错。它实质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个案。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将展开交流的任何两种文化以文化主体为轴心区分为“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或多或少

存在着一致或相似之处。文化交流的理想型的结果是本土文化全盘涵化吸收异域文化或异域文化改造本土文化并将之完全纳入自己的体系。但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形却远非这么简单。

从近代中国乡土教民对天主、圣母和耶稣这三大信仰目标的信仰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教民宗教信仰的形成过程中,穿插着一条(不一定是唯一的)这样的线索:求异——以同证异——异同置换——新旧交合。尽管教民原有的信仰习俗是其无法摆脱的文化背景或者说知识前提,尽管传教士在宣教时借用了不少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概念与语汇,尽管教民的宗教信仰与本土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教民信仰天主、耶稣及崇拜圣母,完全是因为天主教中的神与本土神祇的相似与相合。实际上最初吸引教民的恰恰是天主教之神的新颖,亦即出于教民的“求异热情”。<sup>[34]</sup>因为这种新颖暗含着天主教之神比本土神祇更有效应的可能。但是,一旦新的信仰目标被接受,教民原有知识背景的惯性作用和重塑力就开始凸现出来,它引导、制约着教民对于这些信仰对象及其所蕴涵的宗教观念的理解和吸纳。教民常常有意无意地在本土的各种文化资源与天主教信仰之间寻找联系,如天主与“大父母”<sup>③</sup>、圣母与女神、耶稣与“悲苦英雄”、

**〔收稿时间〕** 2009-02-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07CZS016)“晚清乡土教民的信仰与民间文化——以华北的天主教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李勇(1972—),男,安徽亳州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

刘丽敏(1978—),女,安徽怀宁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sup>①</sup>教民对天主作出了如下颇具特色的理解:“一家有一家之主,一国有一国之主,天地万物有大主造他,不能自有。”“奉教的是恭敬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普世万民的大父母。”(见《致命》卷二,第77页;卷八,第59页。)

信仰上的虔诚与伦理上的孝亲等等,教民就是通过这些联系来领悟天主教的信仰的,这就是“以同证异”。“以同证异”并非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发生作用的一个简单的单向运动,而是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异”与“同”之间展开了复杂的置换,其结果是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诸因素的相互交错,从而出现新旧交织(“新的旧”与“旧的新”)的局面。这是存在于文化交流之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恰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说,“抗拒不速之客的骚扰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十分自然的反应;因此,(当一种文化遭遇其他文化时),总是倾向于对其他的文化进行全盘改造,它接受的并不是这些文化的本然面貌,而是其根据自身的利益所认为的它们应该呈现的面貌。”<sup>[19]</sup>

## 二、神功崇拜与皈依的实现

对神祇的崇拜与信仰是一切宗教的核心。对于中国乡土民众的神祇崇拜,学界多以“多神性”或“混杂性”,“功利性”或“经营性”等提法加以概括。这些特征的共同根源在于,中国民众观念中的神祇是被“人性化”、“功能化”和“社会化”的超凡力量。神被赋予人的秉性,被贴上社会的印记。神人之别主要在于神具有凡人所不能的功能。民众对神祇的态度在好与恶、信与疑之间来回游走。

好恶、信疑的转移则取决于神祇能否如人所愿地实现其功能。由此可见,民众对神祇的崇拜与信仰其实是对神功的崇拜与信仰。因此,他们才会不顾忌神的出身、宗教的门户,而以“灵验”与否为准绳,逢庙烧香,见神磕头,多多益善;同时又可以随时随地地见异思迁,对那些被认为不能满足其愿望的神灵弃如敝履,甚至鞭笞拷问。

近代中国天主教民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天主信仰和圣母崇拜中也处处显露出传统神功崇拜的心理痕迹。对天主、圣母及耶稣等诸圣神功的崇拜与祈求促使教民皈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神功崇拜心理的暗示下,教民借助丰富的宗教联想,将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不同寻常的奇异事迹归为天主的恩宠、圣母的庇佑,如脱贫致富、驱魔治病、添丁进口、惩凶罚恶等等。在义和团运动中,教民甚至将“受伤不流血”、侥幸出逃、天降大雨阻断义和团的进攻等纯属偶然或意外的事件也看作是天主诸神神功保护的结果。诸神的神功是教民坚不背教、勇于反抗或静候致命的精神支柱。教民们丰富的宗教联想一方面是源于其内心强烈的神功期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教会、传教士的有

意推动。运用宗教联想培养教民的宗教信仰是教会对讲徒进行宗教治理的一种手段。在《致命》与《列传》两个文本中,作者的这种立场非常鲜明。下面略举一例,试作分析。

庚子年阴历五月十九日(6月15日),教民崔连氏被义和团杀害,当时她的长子、次子在献县总堂修道院修道。三十三年后的五月十九日(6月11日),教宗比要第十一将她的长子崔若瑟召至罗马,亲自祝圣,立为直隶永年教区司牧,次子玛窦亦与之偕往,二人“在罗马圣京,备受各国人士之欢迎”。对于两个日期的巧合(并不排除教会精心安排的可能),作者作了一番神学意义上的阐发:“这两个日期赶得这样凑巧,不能说是偶然的,更不能说是任何人安排的,平心而论,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天主的圣意,天主如此措置,一来是为显扬崔连氏致命的功劳,二来是为教永年教区的首任主教将自己所得的尊荣,全归功于致命的母亲,不敢自以为功,都见如是,是否允当,请读者自定从违可也。”<sup>[20]</sup>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极力想在“母亲致命”和“儿子祝圣”之间建立一种宗教关联,即“儿子祝圣”是“母亲致命”挣下的尊荣,其目的还是通过这一关联使读者接受天主的恩宠观念。

在神功崇拜心理与宗教联想思维的作用下,教民将各种奇事异迹编织成具有民间传说色彩的“神迹”传闻<sup>⑨</sup>,在教民内部甚至乡土区域社会中广为流传。这些传闻,事虽微小,但也是值得注意的研究线索。按照教义的规定,真正的信仰是反对具象化、巫术化的“神迹”的,尤其反对将天主具象化。但根据中国基督宗教的传教史料,早在明末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之初,为了吸引下层信徒,传教士就开始利用各种“神迹”如驱魔、治病、传教士的尸体经久不坏散发奇香等来渲染天主、耶稣、圣母及诸圣的“灵验”。这种宣教形式究竟是天主教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信仰残余,还是教会受到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启示而激活了传统的形式,难做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教会人士显然意识到了天主教要在中国立足,就必须让天主与中国民间诸神处于竞争态势,而且天主必须在竞争中处于优胜地位。这恰恰反映了天主教信仰和中国民俗信仰在乡土世界里的双向渗透。这些“神迹”是信仰的附属物,不仅为教民而且是一般乡民都乐于传诵的。它们重复强调着天主、圣母、耶稣等信仰目标无与伦比的灵验性,对教民宗教信仰的形成及天主教信仰的延续与扩布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神迹”传闻充分利用了中国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各种元素,它们的逻辑(心诚则灵)、组成元素(诚心或善行,圣神显灵,加倍

的诚心或善行)、表达方式(异梦、秘方或神术传授)以及价值取向(善恶报应)与民间流传的各种神仙显灵传说几无二致。发生在教民身上的偶然性的奇事异迹就这样被神话化了,由此,教徒们从中获得了信仰示范。两套文献中关于这一类型事例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规范的教义、纯粹的信仰往往是经由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模式,而最终进入教民的集体记忆的,即信仰——传闻(说)——更大面积的信仰。它反映的是中国民间叙事传统与乡土文化传播模式对于教民群体的渗透。

### 三、宗教信仰的功利性与 伦理意识的习惯性

宗教信仰与伦理意识是相互规约、密不可分的。宗教信仰为民众零散不系统的伦理意识提供了理想的价值参照体系,伦理意识则是宗教信仰深入民众内心指导民众行为的关键渠道。在民间广泛流传并被民众倾心信奉的因果报应观念可以说是中国民众宗教信仰发育生长的根基。<sup>[9]</sup>除了“善恶必报”的宣扬外,民间的果报观念中还有一个常为人们忽略的伦理内涵:对“他报”的宣扬,对“求报”的鄙弃,正所谓“施恩不求报”。这与正统价值观中的义(“施恩”)与利(“求报”)的取舍是两个具有相同逻辑蕴涵的伦理命题。当“义”与“利”不可兼得之时,正统的道德价值一直是要求人们“取义”而“去利”,即使二者不相冲突时,“取义”与“逐利”在民意的向度上仍是有高下之分的。这与扬“他报”、抑“求报”的伦理立场本质上是相同的。这种伦理立场也渗进民众的宗教信仰之中,即在信徒的善行(义)与神的赏报(利)之间,真正的信仰者应该不问赏报,力行善工。

但正统意识形态对这一伦理立场的宣扬是否代表了民众伦理意识与道德观念的实际情形呢?事实上,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宗教信仰之中,正统意识形态的宣扬、训示一般是缺乏说服力的,民众的意识与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背离,即民众主观上意识到真正的道德或信仰行为应该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动机的,但同时又遏制不住对偿报的期待,“行善积德得好报”才是他们践行伦理或信仰的真正动机。因此,义与利这对在正统的意识形态中常常彼此否定、难以统一的矛盾却并存于民众的伦理与信仰之中。不排除民众会有两难选择的焦灼和忧虑的可能,但多数情况下是现实困境最终压倒理想价值,并且民众对自己这种浑融义利的自相矛盾并无察觉。对于民众宗教信仰与日常伦理意识中都存在的悖论现象,有学者认为原因

主要在于前者,即传统的以现世为归宿的宗教信仰“不需要培养一种非日常的生存态度”,它除了肯定日常德范以外,未能向民众输入更高的道德理想,即使有也未能引诱人们走出自己日常生活的伦理。<sup>[10]</sup>

那么,在近代中国天主教民的宗教信仰中,“义”(信徒的善行)和“利”(神的赏报)是如何被安置的?下面以“信仰冷淡者”的致命动机作为典型试作分析。两套文献中都有一批这样的例子:信仰冷淡者们平时不守教规,行为不端,但在面临被杀的危险时,不是选择“背教”而是将其视为赎罪升天堂的良机因而纷纷主动“致命”。因为他们自知依据平时的信仰状况,不能得到天主的恩宠,但同时又无法割舍对死后灵魂升天堂的热望,再加上教会为义致命的宣扬,他们相信如圣经上所说的,“为义而被窘难者,是有真福的。此时圣教遭难,为天主致命死了,直升天堂。”<sup>[11](卷二,14)</sup>于是,决意趁此机会,赎却以往的所有罪孽,希图“用一场短暂的痛苦去换取灵与肉的两头受益——肉体历尽人间享受,灵魂上升天堂享福”。<sup>[12]</sup>有些教徒还对自己的这种生前不必苦守教规,死后照样升天堂享永福的结局颇为自得:“你别看我这样冷淡,多年不念经,不办神工,我可不是不打算救灵魂,尚且我还告诉你,恐怕这句话教你不爱听,就是我这个轻易不念经不办神工的教友,将来升了天堂,恐怕比你们常念经办神工的人还要在以上,因为我看着如今有致命的机会,我想着用这个法子得天堂。”<sup>[13]</sup>

功利性是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一个显著的并且颇受垢病的特征。从上述教民渴望“毕其功于一役”的信仰心态,以及神功崇拜心理、教民对于天主恩宠的因果报应式的理解中都可以看出,教民的宗教信仰也呈现出一定的功利色彩。我们由此可以推测,与一般民众相比,教民也常常陷入同样的悖论:一方面他们接受并且也认识到了真正的信仰行为不应该掺杂功利的动机,但同时又期望自己的行为能够获得补偿:生前的福报与死后的灵魂升天堂,在生死关头,后者更是成为首选。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的信仰色彩较一般民众突出,“义”不再局限于日常的伦理教导和道德规范,“利”更是具有救灵魂升天堂等等宗教超脱的内涵。与有些学者由宗教信仰解释伦理悖论的思路不同,笔者认为教民宗教意识中的悖论更多地应该是受传统伦理悖论的影响。同中国传统的宗教相比,天主教更为重视教义礼仪的规范性、纯洁性,要求信徒培养一种非日常的生存态度,但鉴于中国传统伦理意识的根深蒂固及乡土教民道德素质的浅俗,在华教会并没有不切实际地向教民灌输更为崇高和抽象的道德理想,而教民自身也未能超脱传统伦理意识的规

约,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一般还是按照固有的伦理意识行事。根据《致命》与《列传》中的记载,对教民的评价一般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宗教性的评价,一是伦理性的评价。前者通常以热心事主、遵守教规为标准内容,而被重点描绘的往往是后者,如善待亲邻、教养子女、不做坏事、遇事忍让、安分守己、公平正直、乐善好施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的伦理话语与传统伦理几无二致。这一方面是人类社会伦理规范的普遍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华天主教无法摆脱本土文化的强大辐射。因此,尽管教民通常会按照教会的训导,以十诫等天主教的教规来标榜自己的伦理,试图表达出自己角色身份的与众不同,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归到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伦理规范上来,以传统的善恶、好坏、忠奸等道德标准来评价自己,以示自己与常人并无不同。因此,对于教民来说,虽然宗教信仰为他们的伦理意识提供了一些新的元素,但这些新的元素并没有塑造出一套新的伦理意识,并取代原有的伦理意识,相反,这些新的元素却被传统的伦理话语涵化吸收,使教民最终仍然未能走出传统的伦理悖论;表面上看来似乎还是宗教信仰的原因,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教民沿承下来的伦理悖论。它反映的还是如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及诺思的“非正规制度约束”理论所强调的文化传统的力量。

#### 【参考文献】

- [ 1 ] 拳时北京教友致命[M].北京教世堂,1920-1927.
- [ 2 ]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1-2)[M].河北献县教区,1935.
- [ 3 ] Chun-fang Yu.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 [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 4 ] 刘丽敏. 圣母崇拜在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中的兴起与扩展[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 [ 5 ] 程款、许蕾. 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信仰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6).
- [ 6 ] 纳钦. 从传说到信仰: 一个蒙古村落民间叙事传统的文化运行——以珠腊沁村公主传说为个案[J]. 民间文学研究,2004(2).
- [ 7 ] 陈筱芳. 中国传统报应观与佛教果报观的差异及文化根源[J]. 社会科学研究,2004(3).
- [ 8 ] 吴飞. 麦芒上的圣言: 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与生活[M]. 香港:道风书社,2001.
- [ 9 ] 周福岩. 神鬼信仰与民众伦理意识 [J]. 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3(1).
- [ 10 ] 程款、谈火生. 灵魂与肉体:1900年极端情境下乡土教民的信仰状态[J]. 文史哲,2003(1).

(责任编辑:张北根)

## Exotic Beliefs in the Local Situations—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Rural Romanists' Faith in Modern China

LI Yong LIU Li-m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rough studying Chinese rural Romanists' belief and behaviors in these two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in the the Yihetuan Movement,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rural Romanists' faith in modern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1)How did this faith come into being?(2)Why did native Chinese choose or convert to Catholic Church?(3)How did this faith influence their lives?It revealed the process of contcict, exchange and blend happe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religious culture in lower social status of China.

**Key Words:** rural society; religious faith; Catholicism; modern China

# 乡土情境中的异域信仰——近代中国天主教民的信仰特征

作者: [李勇](#), [刘丽敏](#), [LI Yong](#), [LIU Li-min](#)  
 作者单位: [李勇, LI Yong\(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064\)](#), [刘丽敏, LIU Li-min\(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 北京, 100083\)](#)  
 刊名: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9, 25(2)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11条)

1. [拳时北京教友致函](#) 1927
2. [献县教区义勇列传\(1-2\)](#) 1935
3. [Chun-fang Yu Kuan-yin: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 valokitesvara](#) 2001
4. [刘丽敏 圣母崇拜在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中的兴起与扩展\[期刊论文\]-北京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3)
5. [程肃欠, 许蕾 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信仰研究\[期刊论文\]-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6)
6. [纳钦 从传说到信仰:一个蒙古村落民间叙事传统的文运行--以珠腊沁村公主传说为个案](#) 2004(2)
7. [陈筱芳 中国传统报应观与佛教果报观的差异及文化根源\[期刊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4(3)
8. [吴飞 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与生活](#) 2001
9. [周福岩 神鬼信仰与民众伦理意识](#) 2003(1)
10. [程\(肃欠\), 谈火生 灵魂与肉体:1900年极端情境下乡土教民的信仰状态](#) 2003(1)
11. [致函](#)

## 相似文献(10条)

1. 学位论文 [孙德洁 上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基督教民群体信仰状态的研究——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2006  
 本文主要是就上世纪之交,即庚子闹教打教风潮时期,中国华北乡土基督教民群体的整体信仰状态作一浅显的勾勒和疏理,再现中国乡村基层教民群体别具一格的宗教意识和信仰特色,及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浓厚的文化心理,从而说明中西文化之间的一种交互式的复杂的交流范式。  
 教民群体是在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内部衍生出来的一个群体,它具有特殊政治、文化色彩和社会边缘性。它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畸形物,他们因为特殊的信仰和行为,特殊的身份认同而成为一具有人际边缘性性格的所谓的“异类”。这种边缘性和特殊性也使得他们的信仰状态表现出来复杂性和特殊性。  
 乡土教民走向耶稣基督的皈依过程是复杂多样的,其皈依动机异彩纷呈,斑驳陆离。中国乡里社会传统民间文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深深的折射在他们信教的动因轨迹中,编织成了一幅复杂的皈依动机和皈依类型的丰富图景,从而也初步展现了他们新的信仰状态。重实用和功利的传统文化心理最具有代表性,尤其在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晚清社会里。世俗功利,宗教功利,还有两种或多种功利目的相交织的皈依,家庭传统影响下的皈依,教理思索渐进性的皈依,渴求来世灵魂升天堂的皈依,突发式的皈依,贞女观念号召和影响下的皈依,为赎今生所犯之罪孽的皈依等等,纷繁复杂。从其走向耶稣和教堂的动机,也可窥探其内心意识、价值取向和文化心理,表现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和人生际遇中的历史行为就更多样化了。  
 特殊的历史情境,为如实再现他们的所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实践提供了绝好的历史契机和展现的舞台。非理智的打教闹教狂潮的掀起,社会陷入了非常态状态。乡土教民群体成为一切矛盾和打击的首当其冲的靶子,面临着极端恶劣的社会情境,他们将作何打算,又将何去何从,特殊的历史时代和情境对他们的宗教信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此时的信仰又将时代和处境做出何种回应?信仰与时代开始了历史的对话和交流,从而表现出了多种信仰状态和信仰行为。自始至终坚守基督信仰,慨然“致命”;迷恋于宗教神迹的崇拜和对神功无限扩大的狂热;执着于世俗利益的永恒不懈地追求;念念不能忘却和割舍的传统家族血亲的乡土文化观念;果报观影响下的纷纷为主献身的行为实践;爱教与爱国、爱国意识上的一致和实践上的矛盾的两难选择等等均为复杂的信仰状态和信仰行为,为我们尽可能的还原其真实的宗教信仰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历史的依据。通过对其复杂信仰状态和行为的层次剥离,不难发现其背后所隐藏的浓浓的本土文化底蕴和特色。  
 通过这一具有特殊性和边缘性群体的历史形成,复杂皈依动机的历史辨析,极端情境下独特的宗教信仰意识、状态和行为模式等等问题的探讨,以期尽力去探索并努力接近乡土教民群体的真实的信仰世界和文化意识心理,从而再现乡土教民群体特殊的宗教信仰、独特的宗教意识及文化心理,来重新认识这一特殊历史群体。在他们的信仰世界和内心深处以及行为实践的背后,自始至终都跳动着本土民族文化的心律和鲜活的脉搏,具有浓厚的本土文化的底蕴和色彩,形成了独特的乡土文化信仰观。所以甚至可以这样说,对于乡村基督教徒来说,基督教也只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参加教徒间的聚会和基督教仪式时表现了他们作为基督教徒的一面,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仍然坚持着乡村社会传统的规则。在基督教色彩的圣衣的背后,是传统乡土文化的浓重的韵味与内涵。这也充分说明了基督主义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置换、新旧的交错融合、中西的种种调适的互动过程。也为我们提供了探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一种交互式的交流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2. 学位论文 [董晓晶 豫西乡土中的基督教会——河南省灵宝市C镇东关福音堂研究](#) 2010  
 本文以人类学的经典方法——田野调查法实地调查了河南中西部一个小县城的基督教堂。当地并没有宗教信仰传统,但是基督教信仰却以燎原之势发展,信仰人数也占据全市宗教信仰人数的一大半。笔者以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为主,结合教会组织以及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提供的相关统计资料,追溯了该教堂的起源和变迁,介绍了该教堂宗教生活内容,分析了教徒的信仰现状,思考了基督教在乡土社会中的本土化之路。该教堂所处的社会环境既不同于经济发达的大都市,也不同于经济文化保守落后的农村,它是基督教进入中国内地,并向乡土社会演进的阶段性成果的一个小缩影。笔者通过对这一地区基督教本土化的实例所作的个案调查,结合乡土社会中特有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对基督教进一步推进本土化进程,与传统文化和谐共存

做出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基督教，传统文化，本土化

### 3. 学位论文 [叶君](#) [农村·乡土·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 2004

该论文由“绪论”和“农村”、“乡土”、“家园”和“荒野”等五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两个基本的题材范畴，即“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小说”的辨析入手，在探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著异的基础上引出问题，即在乡土文学的研究过程中存在概念使用上的含混，要怎么以乡土覆盖农村，要怎么以农村包容乡土。很显然，这种含混所造成的指认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乡土文学研究的深入。基于乡村的四种不同文学景观是包含了客观和主观性内涵的四种不同想象方法在文学创作中的呈现。基于此，绪论第二节对每一种想象方式的具体操作进行了简要论述，得出一些基本的规律。“农村”的生成我认为源自乡土的蜕变，而导致乡土向农村蜕变的根源是由于“他者”的进入。这主要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文化形态等三个方面。由此，一种新的阶级关系覆盖了先前的血缘和地缘伦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进入后也带来了新的经济形态并给人们造成心理上的巨大冲击，产生苦闷、焦虑甚至失落；而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意识有时更带来原有人际格局的改变。总之，因为“他者”的进入使以前相对稳固、古旧的自然村社变为处于变动和重组中的农村。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阶级斗争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乡村的两重基本生活场景，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为切换、挤兑和遮蔽。在该章里以浩然产生于文革前的《艳阳天》和文革中的《金光大道》作为个案具体说明这两重乡村生活场景之间的关系。“家园”，想象的生成从社会历史根源来看，它与80年代中后期以至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文精神失落和社会转型期原有价值判断失范有关，甚至是受到一种“世纪末”的社会情绪的影响，这些社会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当代人精神家园的失落从而也催生出人们对它的寻找与建构。在这种意义上，乡村家园想象是当代中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社会心理在文学领域里的显现。而从个人来看，则大致表现为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生命形态。对于“农裔城籍”，作家们而言，常常体现为对故乡的爱恨交织或情理悖谬；而在有些作家那里则根源予一种童年记忆，甚至是对一种精神和宗教信仰的狂热追求。作家们往往通过一种诗意的言说达于精神家园的建构，由此让“生活在别处”的灵魂“回家”。而精神客居者的回家主要表现为：回到大地、回到童年、回到心灵三种途径。该章第二节还以贾平凹90年代以后的乡村叙事作为对象具体分析作者对乡村家园建构所表达出的理性之思。通过《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系列长篇，他所表达的家园之思主要体现为无望的抗争、微茫的建构以及怀念和谐等三个层面。该章主要以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为对象分析意义在写实、戏谑、异延等古典、现代甚至后现代的种种表达方式里如何流失的运作过程。其意图企图在质疑、戏谑和话语狂欢中裸呈“意义”流失之后处于“荒野”中的生命形态。故乡和故乡的“历史”一次次成为作家进行编码的基本元素，而故乡和历史结合在一起所生成的反讽却成了放逐意义的基本手段，在这批具有寓言品格的文本里它几乎无处不在。

### 4. 学位论文 [葛少恩](#) [丽江传统民居营造艺术及其现代启示](#) 2007

在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地区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同时，国内巨大的工程建设量和疯狂的建设速度使得建筑师无暇顾及建筑的地域属性，从而造成了建筑设计在中国的迅速同质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不仅有着成熟发达的以木结构为代表的传统建筑体系，更有着绚丽多彩的地方民居文化，但是在对传统民居建筑的传承和更新上，在建筑的地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的问题上，中国建筑师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

本文选取丽江纳西族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以传统城镇的空间营造和传统民居建筑的艺术特色作为研究的两大重点，引入建构学等概念展开讨论，一方面着眼于探索可以被现代建筑所传承的本土材料及其工艺和城市空间、建筑造型等处理手法，一方面试图挖掘传统纳西族民居建筑中可以为现代地域建筑所借鉴的特点。

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对本论文的选题，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作了简要的说明；第一章概括简要的介绍丽江纳西族民居存属的背景——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生活、民风民俗、宗教信仰以及民居的发展简史；第二章主要针对纳西族场所与空间构成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其中对现代城市空间设计的启示；第三章主要针对纳西族传统民居建筑形式的艺术特色等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就民居的材料建构艺术作了讨论，包括材料的砌筑工艺、表现方式等传统，并就其在当代建筑创作中的现实意义进行了简要阐述。第五章通过对现代地域建筑概念的重新思考和对地域建筑先驱作品的回顾，讨论了现代地域创作中的新思路，对当代中国建筑师在这一问题上的代表性作品进行了分析，并以丽江民居为例，提出了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建议。最后总结全文并对未来提出了展望。

深入研究丽江纳西族传统民居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所投射出来的民间建筑艺术、建筑文化，传统材料及其工艺，城镇空间的布局，空间模式等等，在科技日新月异、文化交流趋同国际化的今天，是极难得的宝贵财富。

### 5. 期刊论文 [黄挺](#) [HUANG Ting](#) [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国家意识和乡土观念 ——以潮汕双忠公崇拜为例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2, 23 (4)

“双忠公”是潮汕乡村庙宇中最常见的神祇之一。潮汕地区的“双忠公”神信仰开始于北宋。在宋元之交与明清之交，这一民间信仰在该地有快速的流播。而潮州的官师、士绅、乡民对“双忠公”神的象征意义却有着复杂的理解。该文试图通过审视不同历史时期这三个社会阶层对待“双忠公”神的态度，了解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国家意识和乡土观念，以及民间宗教信仰所反映的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

### 6. 学位论文 [刘晓燕](#) [近代乡村社会冲突中教民的身份认同](#) 2008

基督教作为历史上就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宗教，在近代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再次传入中国。随着基督教在华传教势力的扩大和组织上的完善，基督教在中国城乡迅速吸引了大批教徒。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国土上开始形成与本土宗教群体迥异的教民群体。乡土教民的增加在乡村社会掀起了一层层的教民冲突的涟漪，甚至演化为大规模的民教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

本文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基督教民群体发展概况的论述，得出近代乡村社会教民这一特殊群体存在的事实。通过乡村社会成员如何成为基督教民、成为基督教民以后对乡村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的讨论，力图为民教冲突之根源找到新的解答。

本文尝试运用了身份认同的理论，从乡村社会基督教民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呈现了乡土教民对基督教徒身份的选择、建构及确认的过程。在身份选择过程中，不同的身份选择方式影响了教民的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由于教民身份改变而带来的特殊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以及与非教民民迥异的行为习惯，使得他们在村民眼中成为“洋人的附庸”、“二毛子”。乡村教民与基督教发生联系是获得教民身份的起点，通过信教而遵守特殊的教义教规、遵循特定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使教民逐渐建立起对基督教徒身份的认同。同时，来自教民群体之外的他人评价，促使他们进一步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很重要的便是乡土民众对基督教民身份的划分。在加强教民身份意识的同时，也带来了双重身份认同的冲突。乡土教民的基督教徒身份和村民身份代表了不同的身份认同标准和内容。通过对村民及教民身份关系的探讨来看双重身份对教民行为的影响。

由于基督教先天与外来侵略的密切联系，加上中国乡土民众对外来宗教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对近代基督教信仰动机认识上的偏见，认为大多数教民都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信教。本文通过对乡土教民身份认同的研究发现，乡村社会教民的信仰虽然存在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一部分教民还是真正实现了对基督徒身份的认同。随着信仰的日渐坚定，基督教民和乡村社会村民的双重身份带来的矛盾行为对教民的村社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民对乡村社会传统信仰的融合与摒弃，对乡村社会传统仪式的继承与抵抗，不仅给自己带来如何选择行为方式的苦闷，也使他们长期游离于村社群体之外。教民虽努力为自己的双重身份辩白，但两种身份带来的冲突却存在于乡村教俗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近代乡村社会民教冲突的根源。

近代特殊的历史环境把教民无情的推到民教冲突的风头浪尖。面对反教浪潮，村民与教民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使他们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另一方面又促使一部分在生死攸关时刻选择依靠教民身份，获得教会、洋兵的保护，甚至有些教民沦为民族国家的叛徒。但这部分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教民是徘徊于两种身份之间，既想获得生命安全的保障，又为国家多舛的命运而担忧。

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民教冲突根源建立在身份认同理论上的再探讨，充分说明了近代基督教与中国乡土民众的错综复杂关系。对于重新认识近代教民群体，特别是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厘清近代乡村社会民教冲突的根源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 7. 期刊论文 [李发仓](#) [乡土气息和现代精神——评青藏高原多民族乡土文学部分作品 ——新西部（下半月）](#) 2010, (7) (9)

本文分析了当代青藏高原多民族乡土文学作品的特点。在青藏雪域高原其特定的地域、宗教、文化环境熏陶下，作品以环境、多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的融合，展示了不同时代的民族乡土风情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并以其独特的民族特点显示其高原多民族的现代精神。

### 8. 期刊论文 [梁国平](#) [LIANG Guo-ping](#) [乡土社会的宗教信仰——一个全真派道观的人类学考察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6 (9)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一个全真派道观——云台观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和分析，认为在西方社会理论界盛行的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

然二分的前提并不适合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理论探讨. 宗教信仰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个领域, 对乡土社会的发展、文化延续和道德传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欲以云台观的个案对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展开反思和对话.

## 9. 学位论文 舒丽丽 查腊怒族社会中的多元宗教文化研究 2007

宗教作为一种反映内隐于人们心灵深处和外化于行为举止乃至物质形态的社会意识, 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民众的同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宗教通过与民族在文化层面上的结合, 呈现出鲜明的乡土化、民间化、多元化特征. 宗教与文化、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怒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 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的怒江和澜沧江两岸, 其余则散居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和西藏自治区察隅县. 云南省贡山县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贡山县丙中洛乡查腊自然村是一个以怒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区. 在这一村寨中, 既有民间信仰、藏传佛教信仰, 又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天主教、基督教信仰体系. 其多元的宗教信仰体系突出地表现在: 一村之中多种宗教并存; 一家之中有多种宗教信仰; 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并更改其宗教信仰. 宗教文化主要指的是人们在精神信仰基础上围绕宗教及其相关事项而产生的一系列文化行为及活动. 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构成了查腊村多元的宗教文化现象. 多元的宗教文化改变了这一社区的信仰状况, 并影响着他们同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多种宗教信仰长期并存, 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和睦并存的历史过程. 而这一历史过程更是突出地展现了外来宗教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相尊相容性”. 本文通过对多元宗教文化进入查腊怒族社会历史过程的追溯, 针对多元宗教文化与查腊怒族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探讨, 分析现在查腊怒族社会呈现出多元宗教文化包容性并存、“相尊相容”特性的原因, 总结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多元宗教文化已经被整合、嵌入整个怒族民族文化体系之中, 并成为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 多元宗教文化的影响也贯穿于整个查腊怒族社会的运行机制中. 怒族社会的和谐构建, 离不开多元宗教文化的背景和视角.

查腊怒族社会中的多元宗教文化呈现出的包容性并存、相尊相容特性对于素有我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王国”之称的云南省来说, 不但具有典型性更具有普遍意义. 由点及面, 对查腊怒族社会中的多元宗教文化进行研究一方面能够为学理上的宗教多元论、宗教文化论、各宗教间的对话与和平提供实证经验支撑; 另一方面能为我国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提供新的案例, 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新方法, 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思路,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服务.

## 10. 学位论文 马光亭 时间之争——对苏北依村基督教群体的民俗学考察 2007

通过对苏北依村基督教文化群体的个案研究, 本文认为基督教与中国乡村本土信仰抵牾的根源在于二者背后时间观的冲突与碰撞. 康德将时间与空间作为人类认知不可分割的两种先验形式, 同时认为时间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在构成知识方面比空间具有更加深刻的本源作用. 时间作为人类认知与存在的出发点, 深刻和本源地影响着文化的发展走向. 不同的时间观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样态. 本文的立论基础依托于对乡村老百姓宗教经验的理解, 并且认为一种时间文化唯有与老百姓经验世界的实践相互对应, 并构成他们实际行动的选择和策略才是具有生命力的. 因此, 在对中国乡村基督教群体的研究中, 我把源于普通乡民生活经验的“时间”确立为论文的主线, 分成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一、基督教从近现代进入中国乡村之后, 首先通过定期召集教友聚会、礼拜, 建立了一套规范社会生活的社会时间体系. 在这种固定而惯性的时间中, 充斥着基督教信仰的内容. 同时, 这种惯性的社会时间逐渐构成村民日常生活重要的时间指向, 并且培养了人们对这一时间的倾向. 融于全球化时钟的聚会时间与规范乡土社会生活的地方性时间(集期)在优先分配上的相互矛盾, 还只是矛盾最浅层的表现. 聚会作为时空中的人群聚合, 是文化化了的时间和空间. 人们接受了一种时间, 其实也就是接受了其中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在此基础上, 两种时间蕴含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取向逐层展开.

二、解析两种时间观的构成作用与价值取向. 文章认为中国的时间体系是由渗透着阴阳五行观念的, 循环而可预见的“术数化”时日构成. 循环是对过去时间的复现, 中国特色的循环时间与农耕生活、血缘家庭的特殊耦合, 又构成了时间价值的过去取向. 这种过去的价值取向同基督教时间价值的未来取向正好相反. 基督教若想对中国文化进行格式化, 以上帝为核心重组社会关系, 改变聚合状态, 就必须置换掉中国原有社会关系的核心, 即切断向后看的时间价值溯源. 两种时间文化不可避免地交锋在乡村最平常的生活中.

三、在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中, 基督教与本土时间文化的抵牾具体表现在它与历史之学、民族国家、民间信仰、敬宗祭祖四个层面的磨合互动中. 这四个层面的冲突步步加深, 直至达到最后根底性的源头矛盾.

基督教进来了, 中国积淀数千年的时间文化作为乡民认知的“前理解”, 以其厚重的影响力令基督教文化在生活各个层面不断变形. 只要乡土社会依然生活在传统时间体系下, 这种时间仍轨制着所有社区成员的主体社会生活, 那么其本身就注定了作为乡土社会一员的信徒与原有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基督教的聚合形式也只能是家族关系的一种亚存在的延伸. 这也是基督教徒在信仰中出现大量“灰色地带”的根本原因.

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从明末清初到现在, 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21世纪初的今天, 随着全球化的蔓延, 这个问题不但不会消弥, 反而会不断深化. 通过对苏北特定乡村文化场域的民俗学考察, 本文试图展现中国乡村基督徒在时间文化冲突中的表现, 以及他们如何用自己的行动找到问题解决的可能性. 同时, 希望可以通过民俗学的实证研究, 使时间研究不再囿于哲学、神学领域的抽象思辨, 还原鲜活的生活世界.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jkjdxsb-shkxb200902023.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jkjdxsb-shkxb200902023.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49919447-35c9-454b-8583-9e4d00818962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